



论司马光《文中子补传》

孙文起

摘要:司马光《文中子补传》是一篇颇具开创意义的传记。在司马光之前,文人别集中的传记多为当代人物;《补传》之后,重写前朝名人传的现象逐渐增多。文中子王通是儒学传承的重要人物,然而,由于政治、历史等原因,王通事迹不清,记录其生前所言的《中说》真伪难辨,历来争议颇多。在这种情况下,司马光将“长编修史法”运用到单篇传记书写之中,在史料的选汰与铨裁中,实事求是,去伪存真,弥补史传记载的缺失,解决有关王通事迹的争议,使得原本处于创作背后的史料考辨呈现于文本之中。在结构上,《补传》增强了传记的议论功能,相关史实辨析与人物思想评价相互支撑,融为一体,改变了传记以叙为主的固有模式。《补传》是学术发展影响下的文章典范:严谨的史学态度赋予作品“中和笃实”的风格;“一家之言”重新树立起私家传记的史传品格。《补传》在题材与写法上的开拓,为传记书写增添新体,也为纪实类的散文拓展畛域。

关键词:司马光;文中子补传;中说;传记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1)06-0115-07

文中子王通是儒学传承的重要人物,在宋代之前的正史中却很少有其记载。司马光《文中子补传》(以下简称《补传》)补史之阙,考辨王通生平,评述其思想,后人论《补传》之价值,也主要集中在史学领域。近年来,司马光的散文逐渐受到重视,如詹杭伦《论司马光〈温国文正公文集〉中的几篇传记》,探讨了《范景仁传》《圜人传》《猫黪传》《张行婆传》的文学特点^{[1]44}。由于《补传》被收录在《司马温公集》的附录,再加之司马光的史学家身份,《补传》多被视为史学作品。事实上,司马光的《补传》不同于史传,也不同于单独刊行的《高僧传》《高士传》等杂传,而是被收录于文集集中的单篇传记。在司马光之前,文集集中的单篇传记主要记述当朝名臣、名人,如李华《李峴传》、卢藏用《陈子昂别传》、李商隐《李贺小传》;也有不少是自传,如白居易《醉吟先生传》、柳开《补亡先生传》;至于韩愈《王丞福传》、柳宗元《梓人传》、司马光《圜人

传》,则以底层人物的故事言说道理。司马光《补传》之后,补修、重修的前朝明贤传多见于文人别集,以此探讨司马光史学与文学之关系,可见北宋儒学影响下纪实类散文的发展。

一、文中子与《文中子补传》

王通,字仲淹,隋代大儒,生前声誉极高,有“河汾道统”之誉。据隋末唐初杜淹所撰《文中子世家》,唐太宗时的名臣,如魏徵、房玄龄、杜如晦、李靖,皆出于王氏门下。王通所著《王氏六经》(又称《续六经》)声名远播。王通去世后,族人及门生议谥“文中”,整理其生前所言,遂有《中说》一书。

唐太宗时期,朝廷广开史馆,修撰前史,然而,《隋书》却没有王通的记载。杜淹《文中子世家》是当时记述王通事迹最为详尽的材料。杜淹,曾任隋朝吏部尚书,卒于贞观二年(628年),

收稿日期:2021-07-04

作者简介:孙文起,男,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江苏徐州 221116),主要从事唐宋文学及古代传记研究。

是初唐名臣杜如晦的叔父。《文中子世家》记王通事迹虽详,正史却无一言提及,更蹊跷的是,王通门下的名人也无片言称述其师。随着初唐一代英杰相继辞世,王通逐渐被世人淡忘,《中说》及《文中子世家》所载王通之事也变得扑朔迷离。

中唐之后,王通再被提及。韩愈的学生李翱《答朱载言书》,将《中说》与《人物表》《太公家教》并称,认为这几部作品“理胜于辞”^{[2]421}。《人物表》即刘邵《人物志》;《太公家教》是唐代开蒙读物。李翱虽然提倡“文、理、义”三者兼备,但更重视文辞,对王通《中说》评价并不高。直到晚唐,王通方才真正为人重视。皮日休《文中子碑》自称“嗜先生(王通)道,业先生文”^{[3]35};《请韩文公配飨太学书》又将孔、孟、荀卿、王通、韩愈奉为儒道正统。类似的推赞褒扬也见于陆龟蒙、司空图等人著述。晚唐诸子似不在意史传阙载,而是要将王通作为儒道传承的重要人物,重树世人对儒道的信心。

宋人延续了对王通的关注。朱熹云:“太宗朝一时人多尚文中子,盖见朝廷事不振,而文中子之书颇说治道故也。”^{[4]3085}文中子之书,如《中说》《续六经》,体制宏阔,自任甚重。柳开、石介、孙复等人有意复兴道统,文中子之书正得其用。柳开《补亡先生传》称“乐为文中子王仲淹齐其述作”^{[5]246},并为此改名“开”。释家名僧契嵩《书文中子传后》,也力图澄清王通事迹。《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两种北宋时期《中说》的注本,其中阮逸所注《中说》保存下来,序言云:

《中说》者,子之门人对问之书也,薛收、姚义集而名之。唐太宗贞观初,精修治具,文经武略,高出近古。若房、杜、李、魏、二温、王、陈辈,迭为将相,实永三百年之业,斯门人之功过半矣。贞观二年,御史大夫杜淹始序《中说》及《文中子世家》,未及进用,为长孙无忌所抑,而淹寻卒。^{[6]1}

阮逸认为《中说》是弟子辑录王通生前言说,类似《论语》。序中所云王通弟子,如房玄龄、杜如晦、李靖、魏徵、温彦博、温大雅、王孝逸、陈叔达,均是初唐名臣。《中说》又云王通众弟子各承其衣钵:“(通)门人窦威、贾琼、姚义受《礼》,温彦博、杜如晦、陈叔达受《乐》,杜淹、房乔、魏徵

受《书》,李靖、薛方士、裴晞、王珪受《诗》,叔恬受《元经》,董常、仇璋、薛收、程元备闻‘六经’之义。”^{[6]259}然而,受到长孙无忌与杜淹的斗争牵连,王通最终无缘史传。阮逸的推测或有几分道理,遗憾的是,后人对阮逸所注《中说》普遍缺少信任,阮逸所说也未能被接受^①。

《中说》自唐代流传下来,文字内容及篇章次序已较为混乱,其中,有关辨证王通事迹的文章向来颇受质疑:

今世所传本文多残缺,误以杜淹所撰《世家》为《中说》之序。又福畴于仲父凝得《关子明传》,凝因言关氏卜筮之验,且记房、魏与太宗论道之美,亦非《中说》后序也。盖同藏帙,卷目相乱,遂误为序焉……以意详测,《文中子世家》乃杜淹授与尚书陈叔达,编诸《隋书》而亡矣。关子明事,具于裴晞《先贤传》,今亦无存。^{[6]1-2}

据阮逸所作序文,北宋流传的《中说》以《世家》为序,《关子明传》为后序。《世家》是杜淹撰写;《关子明传》即《录关子明事》,王通之弟王凝所作。关子明,即关郎,以易学闻名于世,曾与王通祖上王虬论《易》。

仁宗中后期,以欧阳修、李觏、司马光、程颐、程颢为代表的儒学中坚日渐势大,纷纷致力于儒家道统的建构,王通再次成为关注的对象。此时士大夫更趋向理性,对历史人物不是一味地褒扬或贬损。譬如,李觏赞扬王通,却不忘批评其门生,称“文中子之言,圣人之徒也,传之者非其人”^{[7]42}。

总体而言,宋儒对王通的接受大抵可分为著述整理、思想辨析、事迹考辨等三种路径。柳开、欧阳修以思想为先,兼及王通事迹与著述;阮逸、李觏以文中子之书论其人;司马光则通过考辨人物事迹评述王通之思想。

《补传》写成后,最先有幸一睹的无疑是司马光好友。据《邵氏闻见后录》,邵博的祖父邵雍应是《补传》的第一读者。邵雍也以传赞的形式予以回应:“传(《补传》)成,文正公问予大父康节何如?康节赞之曰:‘小人无是,当世已弃。君子有非,万世犹讥。录其所是,弃其所非,君子有归;因其所非,弃其所是,君子几希。惜哉仲淹,寿不永乎。非其废是,瑕不掩瑜。虽

未至圣，其圣人之徒欤！”^{[8]32-33}。又云，“文正自兹数言文中子，故又特书于《通鉴》语中”，“文正之传，康节之赞，俱未行于世，予做具出之。”^{[8]32}

据其所言，司马光生前对文中子事迹甚为重视，“数言文中子”，想必对其人其事关注已久，又将文中子之事写入《资治通鉴》，弥补了王通正史无传的缺憾。至于邵博所说《补传》在撰成后“未行于世”，或可理解为没有刊行。因此，苏轼《司马文正公光行状》载司马光生前著述，有“《文集》八十卷”“《文中子传》一卷”^{[9]491-492}；南宋汪应辰《与何运使》云“顷承论及文中子，尝见《司马温公行状》，言有《文中子补传》一卷，比方得之，谨以录呈”^{[10]177}；《宋史·艺文志》云“司马光《潜虚》一卷；又《文中子传》一卷；《集注四家扬子》十三卷；《集注太玄经》六卷”^{[11]5173}。以上材料说明《补传》写成后，先是在司马光好友间流传。

由于党争以及后来的靖康之难，司马光诗文在结集、刊刻过程中多有遗失。陆心源《仪顾堂书目题跋》称《传家集》“谢克家、刘峤刊而上之，宋季，光州有版”，“此本八十卷，较光州本已少二十卷”，“《辞枢副疏》《论西夏疏》《张载私谥议》及《宋文鉴》所收《文中子传》皆不载”，又云“《文中子传》则文恭据《宋文鉴》补入”^{[12]155}。陆心源所说的光州本，即《直斋书录解題》所载一百卷本《传家集》^②。明刊本较之少了二十卷，因此，陆心源认为《传家集》刊刻后，在流传过程遗失了部分作品，其中包括《补传》。清人陈宏谋校刊本《司马文正公文集》中的《补传》，据《宋文鉴》补入，之后的整理本大多从之。

二、《补传》的纪事铨裁之法

与司马光同时代的释契嵩，曾撰有《书文中子传后》一文，澄清王通事迹：

读东臯子《王绩集》，知王氏果有续孔子六经，知房玄龄、杜如晦、李靖、董常、温彦博、魏徵、薛收、杜淹等，果文中子之弟子也。读刘煦《唐书·王勃传》，知文中子乃勃之祖，果曾作《元经》矣。绩死于贞观十八载，去其兄之世近，能言其事也。慨房、杜、温、魏、王勃皆不书一字以传文中子之贤，

而《隋书》复失书之，后世故以文中子之事不足信。^③

文中提及与王通事迹相关的史料有两种：一是王绩《游北山赋》自注；二是《旧唐书·王勃传》。王绩《游北山赋》夹有自注，记述王通生平梗概，云：“吾兄通，字仲淹，生于隋末，守道不仕，大业中，隐于此溪，续孔子六经近百余卷，门人弟子相趋成市。”^{[13]32}作为王通堂弟，王绩论兄长之事颇为不平：“仲淹以大业十三年卒于乡，予时年三十三，门人溢为文中子。及皇家受命，门人多至公辅，而文中子道未行于时。”^{[13]33}《旧唐书·王勃传》追溯王通之事，云：“（王勃）祖通，隋蜀郡司户书佐。大业末，弃官归，以著书讲学为业。依《春秋》体例，自获麟后，历秦、汉至于后魏，著纪年之书，谓之《元经》。又依《孔子家语》、扬雄《法言》例，为客主对答之说，号曰《中说》。”^{[14]5004}王勃是王通之孙，《旧唐书》为王勃立传，兼述王通著作，却没有提及王通生平。

北宋释契嵩的《书文中子传后》，主要采用《游北山赋》与《旧唐书》的记载，对《文中子世家》绝口不提。相比之下，司马光的史料视野更为开阔。《补传》称“（所记）皆通之《世家》及《中说》云尔”^{[15]1780}。《世家》即《文中子世家》，《中说》是王通语录，两种文献均为王通门生、后人所编，争议也多。

司马光《补传》的内容分为四个部分：文中子家世、文中子生平事迹、文中子生前言谈话语以及司马光的评论。文中子家世及其生平事迹主要以《世家》为“底本”，文中子语录出自《中说》。纪事部分，司马光并未照搬《世家》，而是旁采史传，以正《世家》不足。譬如，《世家》论文中子世系由来：

十八代祖殷，云中太守，家于祁，以《春秋》《周易》训乡里，为子孙资。十四代祖述，克播前烈，著《春秋义统》，公府辟不就。九代祖寓，遭愍、怀之难，遂东迁焉。寓生罕，罕生秀，皆以文学显。秀生二子，长曰玄谟，次曰玄则；玄谟以将略升，玄则以儒术进。玄则字彦法，即文中子六代祖也，任宋，历太仆、国子博士……江左号王先生，受其道曰王先生业。于是大称儒门，世济厥美。先生生江州府君煥，煥生虬。

蚪始北事魏，太和中为并州刺史，家河汾，曰晋阳穆公。穆公生同州刺史彦，曰同州府君。彦生济州刺史一，曰安康献公。安康献公生铜川府君，讳隆，字伯高，文中子之父也，传先生之业，教授门人千余。^{[6]268}

《补传》记述王氏家族之事较为谨慎：

文中子王通，字仲淹，河东龙门人。六代祖玄则，仕宋，历太仆、国子博士；兄玄谟，以将略显，而玄则用儒术进。玄则生煥，煥生蚪。齐高帝将受宋禅，诛袁粲，蚪由是北奔魏，魏孝文帝甚重之，累官至并州刺史，封晋阳公，谥曰穆，始家河、汾之间。蚪生彦，官至同州刺史。彦生杰，官至济州刺史，封安唐公，谥曰献。杰生隆（王通之父），字伯高，隋开皇初，以国子博士待诏云龙门。^{[15]1777}

《补传》有意纠正《世家》之弊，故删削不实之辞。譬如，《世家》追述王通十八世祖，而《补传》仅言及王通六世祖王玄则，至于《世家》所记六代以上之事，因其玄远而有意回避。《世家》称王氏“家于河汾”，司马光据《旧唐书·王勃传》，改称王通祖籍“龙门”。《补传》对《世家》又有增益。如《补传》称王蚪奔魏一事，即不见于《世家》所载。

《补传》论说精彩之处在于史实考辨。《补传》主要的史料来源是文中子《中说》和《世家》。两种史料均存在问题，《世家》记述得较为完整，征实性却有不足；史传虽可信，然记载不详。为使人物生平征实、完整，《补传》以杜淹《世家》为底本，兼采正史，以补订《世家》阙误。司马光对各种史料一视同仁，通过对比，择善而从，弥补各类文献的不足。

从史料选汰的角度，《补传》使用了类似《资治通鉴》的长编修史法，将有关传主的各种史料——包括正史和杂史，按时间为序甄选排比，在历史回溯中发挥史料的最大效能。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云：“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16]9739}高似孙《纬略》云：“《通鉴》采正史之外，其用杂史诸书，凡二百二十二家。”^{[17]246}可见，在《资治通鉴》编撰之前，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作为基础性工作首先展开。司马光及其助手范祖禹、司马康等人在网罗各种材料的基础上

先成《长编》。《长编》涉及的史料十分广泛，司马光《与宋次道书》以及李焘《进续资治通鉴长编奏状》对此均有详述。

长编修史法要求史学家不但要有开阔的史料视野，还应具有较高的史料甄别能力。杂史、杂录中的史料固然有其价值，要有效使用，则需仔细斟酌。譬如，《补传》云：“唐室既兴，（王）凝与（王）福峙辈，依并时事，从而附益之（《中说》）也。”^{[15]1780}王凝是王通之弟，王福峙乃王通之子，司马光认为两人对《中说》多有增益。此外，据杜淹《世家》，王通门生众多，司马光也认为言过其实，云：“隋史，唐初为也，亦未尝载其（王通）名于儒林、隐逸之间，岂诸公皆忘师弃旧之人乎？何独其家以为名世之圣人，而外人皆莫之知也？”^{[15]1781}针对王福峙所云杜淹与长孙无忌有隙，陈叔达撰写《隋书》心畏长孙无忌，使得史传无载王通之事，司马光辨析道：“（陈）叔达，前宰相，与无忌位任相埒，何故畏之？魏征实总隋史，纵叔达曲避权威，征肯听之乎？”^{[15]1780}又云，“（杜）淹以贞观二年卒，十四年君集平高昌还而下狱，由是怨望，十七年谋反，诛。”^{[15]1781}言下之意，史传的阙载与政治无关，王福峙、王凝等人欲为父、兄张目，夸大王通声名，诸多历史疑问因此产生。

《补传》对于《中说》并非随意摘录，而是选取其中与宋儒道德价值相合之论，以图改善士风与世教：

美哉，艺也。君子志道、据德、依仁，然后游于艺也。

名愈消，德愈长，身愈退，道愈进，若人知之矣。

庄以待之，信以应之，来者勿拒，去者勿追，沉如也，则可。

善接小人，远而不疏，近而不狎，颓如也。

苏威好畜古器，通曰：“昔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物。”^{[15]1779-1780}

以上引文，说明司马光对王通的道德性命之说比较认可。当然，司马光对王通的思想学术也有批评。《补传》云：“余读其书，想其为人，诚好学笃行之儒。惜也其自任太重，其子弟誉之太过。使后之人莫之敢信也。”^{[15]1783}又云，“先王

之六经,不可胜学也,而又奚续焉?续之庸能出于其外乎?出则非经矣。苟无出而续之,则赘也。”^{[15]1783}王通撰有《续六经》,在北宋时已亡佚。司马光认为王通续写“六经”是狗尾续貂,且认为王通思想中的非儒成分,容易流入释、道,司马光借此表达抵排佛、老的主张。当然,司马光并未将此一并归罪王通,而是认为王通门生企图为师门造势,致使“世人讥其僭而累其美”^{[15]1783}。司马光补撰文中子传,正是要还原历史,给予王通客观评价,以正后人视听。

三、《补传》与传记书写的创新

隋开皇十三年(593年),隋文帝下诏禁止私撰国史^④,中央集权强化对史书编撰管控愈严。管控的方式包括完善史官体制、规范史述行为、打压私史编撰。唐宋两代,官方史学不断完善,然而,官史的强势并没有限制私史的发展。相反,各类私家史学著述蓬勃发展。据《新唐书·艺文志》以及《宋史·艺文志》的“传记”类目,传、录、事、状、叙(序)构成体式繁杂的传叙文类。传记名目的繁多意味着传记书写对象日益广泛,传记的内容更加丰富。譬如,在唐代,私下撰写的单篇传记并不多,宋代之后,单篇传记常被收入文人别集或文章选集。据统计,见于《文苑英华》的唐人传记约有三十余篇,《全宋文》收录的宋集传记多达二百余篇,其中不乏欧阳修《六一居士传》、苏轼《陈公弼传》、苏辙《巢谷传》等大家名篇。被收入文集的传记多属于私撰,相比正史传记,文人私传取材广泛,书写对象多为同代相知之人,内容体制不拘泥于成法。宋代之后的文人别集及文章总集,单立“传”体已为常态。文章选本或文体批评,多有探讨传记渊源流变,如南宋真德秀《文章正宗》称《史记》中《孟荀传》是传之“变体”,明代吴讷《文章辨体》称韩愈《毛颖传》是“变体之变”^{[18]49}。在古文家看来,文集中的传记由“史传”发展为“新传体”,已入集部文章的范畴。司马光《补传》属于文集传记,不同的是,《补传》书写对象是前朝人物,此在唐人私传中并不多见。

在写法上,《补传》也有新颖之处。一方面,《补传》兼有史传与史论的特点,作者以史实考

辨补正史之阙,又摘《中说》之言,评述传主思想,将史料考辨呈现于传记书写之中。史料选汰颇能体现传记书写者的求实的精神与学术素养。史料铨裁之优劣取决于作者史识,稍有不慎,会牵连政治。因此,国史编撰常照抄行状、家传、墓志,以此减省心力,规避风险^⑤。反观王通事迹,缺乏完整而可信的史料文献,《补传》辨明其事,还原史实,这种对历史人物的学术考辨,是《补传》的优势所在。另一方面,《补传》增强了传记的论说功能。史论赞本是纪传体史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在日益僵化的史官体制下,史官的褒贬之义难以发挥。私家传记则能够更好地继承太史公“成一家之言”的传统。作者的主观意志成为显性的存在,记他人之事同样可以投射自我。如果说在史料选汰的过程中,作者是隐匿的“剪刀手”,那么,传记的论说则将作者推向文本的中心。《补传》有近一半篇幅用于论说,论说的内容包括王通的史实辨析、历史接受、著述及思想评价,传末又阐述《补传》写作目的,内容丰富,远超史传论赞。《补传》丰富的论说内涵,体现了北宋纪实文学崇尚理性、追求致用的鲜明特色。

《补传》深受道学家文章观念的影响。司马光自称不善于作文,《答陈允秘校书》云:“光未知足下之志,所欲学者古之文邪?古之道邪?若古之文,则某光平生不能为文,不敢强为之为对,以欺足下;若古之道,则光与足下并肩以学于圣人。”^{[15]1237}所谓“不能为文”,并非力之所不及,而是作者认为“道胜文不难自胜”,将文章道义价值置于文采之上。司马光的文章观念在两宋学界颇能找到知音。譬如,北宋“二程”、南宋朱熹皆以“实学”为“格物”基础,又以“事实”为“致知”途径,与司马光的思想学术可谓源流一致。

道学家的文道观念施用于文章,形成“中和笃实”的文章风格。

“中和笃实”的首要命意在于“中道”。司马光对儒家“中庸”思想尤为推崇,其《中和论》云:“中、和一物也,养之为中,发之为和。”“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达道也。”^{[15]1456}所谓“中和”,即是中庸。中庸讲求不为偏倚,就纪实类文字而言,便是在史料中求真,史义上守正。

譬如,《补传》摘引《中说》,对其中释、老之说多有批评,是“褒贬”精神在传记书写中的体现。

中和笃实又蕴含着“有为时用”的文章理念。治史考前世之鉴,文章为当世之用。宋儒学术、文章多求致用。苏辙《欧阳文忠公神道碑》云:“(欧阳修)从尹师鲁游,为古文,议论当世事。”^[19]¹⁴²⁵欧阳修倡导诗文革新,发挥古文的论说优势,实现致用之目的。对于司马光而言,《补传》的意义并非为某人扬名,而是要重树儒家道统,夯实儒学复兴的根基。

中和笃实在行文上具有文辞简要精准、逻辑周延细密、气韵质实厚重等特点。《补传》叙事部分平和质实,简练精确,体现了学者文章的严谨。论说部分以理运辞,层层析理,思辨缜密,自信可信。作者追求严谨的学术表达,行文简洁,语言朴实。《补传》虽无诗性的张扬,却有理性的光辉,是道胜文不难自胜的典范。南宋吕祖谦将其收入《宋文鉴》,便是最好的证明。

在《补传》之后,王令《段秀实太尉传》、吕南公《重修韩退之传》、晁说之《扬雄别传》、胡寅《子产传》《诸葛孔明传》、范浚《汉忠臣翟义传》相继而出。此类文章的共同特点,是作者以研究者的姿态深入写作,考辨前朝名贤事实,评价人格、思想及政治得失。由于所书对象通常存在历史争议,作者通常将史实探寻与史义建构呈现于文本。司马迁整齐百家杂语,成一家之言,《史记》中的《伯夷列传》《孟荀列传》也成为“一家之言”的典范。唐代之后的国史传记在制度约束中趋于板滞。以司马光的《补传》为代表的前朝人物传,旨在重倡一家之言的史学传统,体现了两宋私家纪实文学的变化。

《补传》提升了私家传记的文体地位。中唐以前,“耆旧传”“列女传”等旧体杂传,有叙而无论或叙多而论少,史料属性更为突出。在史家目录中,传记始终是“史传之余”,地位不高。中唐之后,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陆龟蒙等人传记愈发具有集部文章的特质。自传、别传,如《五柳先生传》《陆文学小传》,以抒情言志为主,文学意味更强。北宋初期,王禹偁《乌先生传》《滁州五伯马进传》再续韩、柳传记之神韵。正如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所云:“唐以前作史者专精于史,以文为史之余波;唐以后能文

者泛滥于文,以史为文之一体。”^[20]¹³¹司马光《补传》一改“别传”“小传”的文体卑微,以学者姿态考辨事实,扬弃前人思想,自铸“中和笃实”的文章风格。与史传相比,传主的中心地位被弱化;与中唐以来所兴起的文集传记相比,《补传》所体现的严谨的学术风格、深刻的理论思辨,彰显纪实文学的理性色彩。经史与文学的距离取决于世人对“文”的认识。当“诗赋欲丽”成为文学的宗旨,经史的体制规范是区别于狭义文章的重要标识;当“文以载道”回归文学本位,经史学术“征实”“致用”等理念,则是集部文章的应有之义。

北宋中后期,私传创作愈加繁盛。记叙前朝人物的作品,如王令《段秀实太尉传》、吕南公《重修韩退之传》,心存现实致用之理想;当代人物传记,如欧阳修《桑怿传》、司马光《范景仁传》、苏轼《陈公弼传》,讲述作者与传主的交往经历,在他人之事中抒发己怀。南宋理学家的传记更加尊道崇实,如胡寅《诸葛亮传》、朱熹《刘子和传》、杜范《詹体仁传》,标举“实学”,倡导“致用”,与司马光的传记理念遥相呼应。顾炎武《日知录》云:“自宋以后,乃有为人立传者,侵史官之职。”^[21]¹¹⁰⁶顾氏之说意在表明宋代私家传记创作之盛,引申言之,则意味着经史之学渐入集部之文。在此过程中,《补传》的出现,为传记书写增添新体,也为纪实类散文开拓畛域。

注释

- ①南宋洪迈的《容斋随笔》便认为《中说》是阮逸伪作。详见洪迈《容斋随笔》(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27—228页。②《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七云:“《传家集》,一百卷。丞相温国文正公涑水司马光君实撰。生于光州,故名,今光州有集本。”引文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498页。③释契嵩《镡津文集》又有《文中子碑》,于王通事迹甚略,止云“唐兴,得其弟子辈”,“文中子之弟子为天子相将,其教也播及于今”。相对《补传》,事迹较为简略。引文见释契嵩《镡津文集》卷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252—253页。④《隋书》载隋文帝诏曰:“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详见魏徵《隋书》卷一,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38页。⑤《续资治通鉴长编》载曾巩任史官,神宗皇帝告诫其不要在史书中大发议论:“(元丰四年八月庚申)史馆修撰曾巩兼同判太常寺,诏公专典史事,更

不预《两朝史》。上曰：‘修史最为难事，如鲁史亦止备录国史，待孔子然后笔削。司马迁材足以开物，犹止记君臣善恶之迹，为实录而已。’王珪曰：‘近修《唐书》，褒贬亦甚无法。’上曰：‘唐太宗治僭乱以一天下，如房、魏之徒，宋祁、欧阳修辈尚不能窥其浅深，及所以成就功业之实。为史官者，材不足以过其一代之人，不若实录事迹，以待贤人去取褒贬尔。’”可见，即便是皇帝，也不支持在史书的修撰中属入史官一己之见。引文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十五，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7619页。

参考文献

- [1] 詹杭伦.论司马光《温国文正公文集》中的几篇传记[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2015(1):44-49.
- [2] 李翱.李文公集[M]//四库提要著录丛书.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
- [3] 皮日休.皮子文藪[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4]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5] 柳开.河东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
- [6] 张沛撰.中说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3.
- [7] 曾枣庄等.全宋文[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 [8] 邵博.邵氏闻见后录[M].北京:中华书局,2017.
- [9] 苏轼.苏轼文集[M].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 [10] 汪应辰.文定集[M]//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
- [11] 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12] 陆心源著,冯惠民整理.仪顾堂书目题跋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9.
- [13] 王绩.王无功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4] 刘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15] 司马光.司马光全集[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
- [16] 司马光.资治通鉴[M].李文泽,霞绍晖,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1.
- [17] 高似孙著,左洪涛校注.纬略校注[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 [18] 吴讷.文章辨体序说[M].于北山,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 [19] 苏辙.栾城集[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7.
- [20]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 [21]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奕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The Study of Sima Guang's *WenZhongzi Biography*

Sun Wenqi

Abstract: The Biography of WenZhongzi which was written by Sima Guang was an innovative works. Before Sima Guang, some biographies in anthologies had been mostly contemporary figures; after the biography of WenZhongzi, the phenomenon of rewritten the biographies of celebrities in the past gradually increased. WenZhongzi was Wang Tong who was important figure in the inheritance of Confucianism, however, because of some reasons about politics and history, the life story of Wang Tong was not clear, the *Zhong Shuo* which recorded the speech of WenZhongzi had to do with lots of controversies. In this case, Sima Guang applied the method of compiled *Zi Zhi Tong Jian* to *Wen Zhongzi biography* and researched the historical facts in realistic attitude. It was to solve the disputes about Wang Tong life. The Study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behind the original creation were presented in the text. In terms of article structure, Sima Guang enhanced discussion function of biography. The study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the evaluation of human thought were supported and merged each other, the pattern of narrative biography was changed. *WenZhongzi biography* was literature classic in the influence of academic: rigorous historical attitude endowed the works with a style of "harmony and sincerity"; independent historical perspective re-established the historical tradition of biographies. The development of subject matter and written style of *WenZhongzi biography* was to add new style for biography and to expand the content for prose.

Key words: Sima Guang; *WenZhongzi Biography*; *Zhong Shuo*; Biography

[责任编辑/周 舟]